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俄罗斯) 普希金 著

Я помню чудное мгновенье



戈宝权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俄罗斯) 普希金 著

Я помню чудное мгновенье



戈宝权 译

名著名译诗丛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 (俄罗斯) 普希金著 ; 戈宝权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6

(名著名译诗丛)

ISBN 978-7-5360-6474-4

I. ①我… II. ①普… ②戈…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553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 瑛
责任编辑: 张 瑛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杨亚丽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4.125

字 数 8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出版说明

周良沛

1



我
记
得
那
美
妙
的
瞬
间



为此书名，煞费苦心。

因为，推介 19 世纪，现代标准俄语、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誉为“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俄国诗歌的太阳”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1799—1837 年），以这么一个小册子，除了他那同样经典的小说及文论、政论外，仅从诗人的叙事诗、童话故事诗、诗剧、诗体小说之中，哪怕象征性的“选”出那么一点篇什，用以点缀于此，此书都无有容纳它们的容量。仅以抒情诗而言，诗人一生写了 800 多首，不仅有爱情的抒情，还有政治及多方的抒情，此处译辑的，沧海一粟，何足以道。那些已经用滥了的《诗选》之名，于此是不适用的。

最后，还是以米哈伊尔·格林卡（М. И. Глинка，1804—1857）所谱曲而广为传唱的《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借为书名。



格林卡与普希金，是同时代相提并论的，俄国民族乐派的音乐家。1818年，他14岁在彼德堡的寄宿学校学习，同桌的同学，正是普希金的弟弟。当他进入彼德堡的社会生活，热衷参与文学艺术活动时，在他的文学老师，也是一位坚定的十二月党人，同是普希金的同学丘赫尔别凯尔的家就认识了普希金，开始了他们永恒的友谊。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取材于普希金的同名神话长诗。原先，普希金是准备参与改编的，却因诗人在决斗中惨死而留下永久的遗憾。1839年，诗人死后3年，作曲家喜读诗人1825年同旧时女友安娜·彼德洛夫娜·凯恩，在穷乡“囚禁的阴暗生活”之中，重逢又再别时，以此时“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之倾诉，以《致凯恩》做了他俩临别的纪念。然而作曲家却以此诗的首句为名，谱曲赠予凯恩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叶尔莫拉耶芙娜·凯恩。诗、曲，寄托了俄国同代诗、乐的二圣，分别对一家母女的爱，也是一则传奇。

此歌，传唱不衰，是俄罗斯情歌中的经典。诗人“心灵开始复苏”的“那美妙的瞬间”，“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有了爱情”所赐予凯恩的个人之情，一经传唱，成公众所喜爱，唱老了170多年，又日唱日新的歌，为了人们共同的人生体验和寻求，它也成了公众所期盼的美好，不仅“有了爱情”还“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的感情之表述，是普希金有代表性的诗的符号之一。



但是，说它是“普希金有代表性的诗的符号之一”的“之一”，就不是“唯一”。其实，诗人早在跨出校门，踏入社会不久，就参加了与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幸福同盟”有联系的文学团体“绿灯社”；他的第一篇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所用的人民丰富的语言，也是向贵族的文学传统挑战；他歌颂自由、抨击农奴制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也成了当时解放运动实际的代言。何况，诗人在流放途中押解到他父母的领地，交予地方当局和教会监管的岁月，他还写了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重要部分的三至六章。其中十二月党人起义一周年前夕写成的《致普希钦》，表达对他少时同学的十二月党人之情，谁也无法将这种爱，拘于个人私情。当我们从他16岁写的《墓志铭》自述“心地善良”，“实实在在是个好人”，到他决斗而死的前几个月所写的《纪念碑》也说：

我所以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了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后来，成熟了的普希金，虽然不可能和少时的思想完全一致，但也可以看到他一脉相承的思想基因。

对他，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维·格·



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说：“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的光辉夺目的洪流。”旧俄与苏联两个时代和两种体制下的文学权威对普希金都是如此评价，我们还需多说什么呢？

二

可惜，对于语言艺术的诗歌，我们中文读者，无法感受普希金所创建的俄罗斯的文学语言，以及他确立俄罗斯语言的规范所闪现于诗的魅力。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说过：“毫无疑问，是他创立了我们诗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学语言。”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说：“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所反映出来的风景。”正是果戈理所说，“他像”，不，他不是“像”，他就是“一部辞书”。后人编辑的《普希金语言辞典》，就是堂堂四大卷。

生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尤其是诗，她是文学中的文学。普希金所以能辉煌它，并无任何神秘之处。是他从小与朝夕相伴的乳母，以她的日常用语，到唱的歌谣，到讲述的民间故事，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到



后来直接进入了诗人的童话诗。这是他的语言“宝藏”最初的开掘，到他掘出它的“全部宝藏”，以其“力量和灵活性”灵动了他的诗行，并规范了丰富的俄罗斯人民的语言。那已是他文学之外的，对俄罗斯民族的丰功。

而且，这个民族，不仅是文学，音乐、绘画等等的发展，都紧系它的草根性。列夫·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1828—1910）为之流泪，感到从中听到俄罗斯底层人民心声的《如歌的行板》，它主题的音乐语言，则是柴可夫斯基（П. И. Чайковский，1840—1893）写作时，追着窗外传来的歌声寻去，记下一位工匠所唱的一首民歌，他曾两度编进自己的乐曲，都大获成功。那个时代，辉煌俄罗斯文学艺术盛世的大家、大师，他们的成功之路，大多都有从民间如此汲取创作营养的一段历程。对于我们不能直接从俄语感受普希金语言魅力的读者，虽有遗憾，但也应当看到：普希金掘宝所掘出的语言艺术之语言，开初并未自觉到它对创作的功利，而是他人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存在，这是我们当深思的。

现在，编辑于此的这些普希金译诗，当然是专为只能从汉语感受她的读者所译。早在1933年，从鲁迅（1881—1936）先生创办主编的《译文·普希金专号》全面介绍的普希金，到1937戈宝权先生零星译出普希金的诗，都是70多年前的事了。为了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1947年，戈宝权（1913—2000）主编，收有包括他这多译诗的《普希金文集》，除解放前“时代”



版前后4次印刷，解放后新版前后9次加印，印数多达12万多册。它的读者，虽然不能从原文深读普希金，也必然从这些译笔感受到对普希金审美的愉悦，感受到原作并未因为译成另一种语言，失去诗所以是诗的诗意，失去她所诗化的思想和诗情，才与读者没有隔阂。从诗人1815年少时的《我的墓志铭》看：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他年轻的缪斯，
在爱情与懒惰中，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生，
他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可是他心地善良，
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从它，到18年后的1833年，写《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也是诗人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皆已完成之后，为相伴年轻貌美的妻子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开始无谓地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债台高筑，不堪负担。为此，他不能写作，很想离开彼得堡。可是，在这几年之前，他那“从前有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地过了三十又三年……”虽然它已从俄语译成汉语，但那娓娓道来，如与挚友谈心的亲切感仍然是可以感受到的，它那行文毫无花俏之处的叙述之朴素，而朴素又是无华的诗之真诚，更是明白无忌的。《墓志铭》的语言虽然不乏此一诗体的幽默味，也不像现代人以所谓的“幽默”搞笑的装腔作势，同样显出少年人带有稚气的真心之所



想。它的“幽默”效果，正似我们看到周围的小朋友学着大人说话的大人腔，看到他无忌的天真，泛起一丝会心的微笑。所以，戈宝权译成汉语后，读者对她才会迸发如此的热情，我们才会将她列为普希金抒情诗的“名译”向读者介绍。戈先生对他的译诗，几十年间不断打磨，精益求精，如《纪念碑》中过去译为我曾“唤起人们的善心”现在则改为“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了。孰是孰非，不是这里的议题，从它看到的，绝对是戈先生对此的用心。为此，读这些译诗时，不妨请看一看《译者二题》。

2011年12日

译者二题

戈宝权

8



名著
名译
诗丛

—

每当讲起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讲起俄罗斯诗歌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想起普希金的名字，因为他是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和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他一向被尊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这正如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的：“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他还把普希金著名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也正如另一位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赫尔岑所说的，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残酷的时代”里，“只有普希金的响亮的和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震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满了今天的日子，并且还把它的声音投向那遥远的未来”。普希金的



同时代人和好朋友果戈理曾经这样讲过：“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的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典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的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净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曾多次讲起普希金，他说：“普希金的创作，是一条诗歌与散文的辽阔和光辉夺目的洪流。普希金好像在寒冷而又阴沉的国度上空，燃起了一个新的太阳，而这个太阳的光线立即使得这个国度变得肥沃富饶起来”。他还说：“普希金是一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奠基人；这种结合，至今还是俄罗斯文学的特色，它赋予俄罗斯文学以特有的色调和特有的面貌”。正因为这样，普希金的名字和他的不朽的文艺创作，不仅在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史上形成了一整个的时代，同时它们也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宝库，并给予全世界各国的文学以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一生中写了将近八百首抒情诗，十几篇叙事诗，一部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多篇诗剧。早当他在皇村学校读书时，就从事诗歌的写作，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抒情诗是《给纳塔利娅》（1813）。1814年他的《致友人》一诗，发表在《欧罗巴导报》上。1815年皇村学校举行公开考试时，他当



时朗诵了《皇村回忆》（1814）一诗，深得到老诗人杰尔查文的赞赏，认为他“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普希金早期的抒情诗，多半以歌颂爱情、大自然和哀歌为内容，喜欢引用古典，带着模仿的性质。这时他既在吸收前人和当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重视民间诗歌的语言，逐步打破陈规，为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建立了基础。1817年至1820年，他在彼得堡任职期间开始走上独创性的道路。他这时写的政治性的诗歌《自由颂》（1817）、《童话·圣诞节颂歌》和《致恰阿达耶夫》（1818）等诗，歌颂自由，反对农奴制度，抨击沙皇专制暴政。这些诗歌当时以手抄本流传，影响很大，他实际上已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在诗歌方面的代言人。1820年至1824年，普希金因写作歌颂自由的诗歌被流放到俄国南方去，这时他深受拜伦的影响，也是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全盛时期。1824年至1825年他被囚禁在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他写过不少优美的抒情诗，如关于他的奶娘的《冬天的夜晚》和《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都是这时期的名作。从1825年起，用普希金的话来说，他走上“现实的诗人”的道路，他的诗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在《酒神祭歌》（1825）、《先知》（1826）和《致诗人》（1830）等诗中，都写出了他对诗歌的观点。他认为诗人应该像先知一样，“要走遍陆地和海洋，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灵烧亮”。就在30年代前后，他全心地同情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被流放的遭遇，



他用《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和《阿里翁》（1827）等诗寄托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怀念之情。1831年普希金结婚以后，被俘于宫廷，写的诗逐渐减少，而偏于写作散文作品和从事研究工作，但他在逝世前半年写成的《纪念碑》（1836）一诗，却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遗嘱。他预言：“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民善良的感情，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还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普希金本人曾经说过：“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这可说是他对自己的诗歌所作的最好的评价。

二

回想起来，那已是50多年以前的事啦。1928年当我15岁时，我进了上海大夏大学的预科，当时曾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借到安寿颐翻译的普希金的小说《甲必丹之女》（现通译《上尉的女儿》），这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普希金的著作，但读到他的诗歌作品，却是稍后的事。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以后，我暂住在上海旧法租界环龙路（现南昌路）我叔父戈公振的住处。我的叔父当时建议我学习俄语，于是我就跟环龙路上的一个俄国教师学习了两个多月的《俄语识字课本》。在初学了一些俄语的基础知识之后，他介绍我到



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一家名叫“俄罗斯曙光”书店的租书部去租了一本普希金的童话故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当读到“从前有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蓝的大海边；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地过了三十又三年”这些美丽而又朴素的诗句时，它们立即把我带进了普希金的诗歌作品的世界，这就成为我接触到诗人普希金的开始。

1935年当我22岁时，我作为天津《大公报》的驻苏记者前往莫斯科，同时还担任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识》和《申报周刊》等刊物的特约通讯员。我在三月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住在城中心距离红场不远的有名的“大饭店”，我当即沿着高尔基大街一直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向耸立在普希金广场上的俄国伟大诗人的铜像表示了我最初的敬意。后来我住在小布龙尼街和第五特维尔-亚姆斯克街时，差不多每隔一两天都要从普希金的铜像前面走过，因此我在莫斯科的许多美好的日子，又都是在普希金广场附近度过的。这时我在自修俄语，勤读普希金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我尤其喜欢他的政治抒情诗和描写美丽的俄罗斯大自然的诗章。普希金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我对俄语的知识，同时也更加增强了我对普希金本人和对俄国文学的热爱与感情。

当1937年2月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时，我正好在莫斯科。那时我翻译了他的《致恰阿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为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编辑了一期纪念普希金的特刊；参加了在莫斯科、



列宁格勒和在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举行的纪念活动；还为上海的《文学》月刊写了有关普希金逝世百年祭的长篇通讯。首先是在2月10日这一天的中午，我参加了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举行的普希金铜像的迁移和揭幕典礼；当天晚上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盛大的纪念会。2月16日全苏联普希金展览会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开幕，我曾把鲁迅主编的“译文”杂志普希金专号和普希金作品的中译本，赠送给展览会陈列出来。2月18日是普希金在100年前安葬的日子，我事先赶到列宁格勒，浏览了皇村（现名普希金城），参观了普希金读过书的皇村学校和有关的地点；到了在冬宫附近莫伊卡河边的普希金故居，这是他后期生活过和决斗后与世长辞的地方。接着我到了普斯科夫省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这原是普希金在1824年到1826年被沙皇当局禁局的地方。我恰好住在圣山镇的旅店里，因此我常登上旅店后面的圣山修道院，瞻仰了普希金长眠的墓地。我还曾有好几次乘着雪橇，去访问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邻近的三山村。沿途的雪景是那样美丽迷人，于是我就想起普希金写的“严寒和太阳；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和“冬天来啦！……农民兴高采烈地坐上雪橇去探寻路径”等诗句。我参观了普希金的故居纪念馆和他的奶娘住过的小屋，怀着激动而又崇敬的心情在留言簿上题了字；我还又参加了2月18日在庫昌湖的冰上举行的纪念活动。尽管这都是50年前的事啦，但当年参加普希金逝世百年祭活动的情景，一



直到今天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最珍贵而又最难忘的纪念，同时这也成为我后来走上翻译和研究普希金诗歌作品道路的一个起点。

1938年初，我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抗战胜利后，我在1946年初回到上海。在同苏联友人罗果夫会晤以后，我们决定为了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由我负责编辑一本厚达400多页和图文并茂的《普希金文集》，于1947年12月出版。在这本文集中，我翻译了魏列萨耶夫写的《普希金传略》，还翻译了普希金的40首抒情诗和两篇童话故事诗，此外写了《普希金在中国》的研究文字。同时我还又和葛一虹合编了一本《普希金画传》，并为《开明少年》翻译了普希金的一篇长达1000多行的童话故事诗《沙皇萨尔坦的故事》。《普希金文集》出版以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和欢迎，在1948年再版过一次，1949年又再版过两次；从1954年改排新版，到1957年已印过9版，总印数达十二万四千册，从此就不难看出这本文集是怎样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且在苏联的文艺界和研究者当中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得到很高的评价。

从50年代初起，我在莫斯科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期间，陆续收集了不少普希金的著作和研究他的论著。1956年五六月我在列宁格勒时，曾专门访问了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又名普希金之家），见到了托马谢夫斯基和阿列克谢耶夫等著名的普希金学者，亲眼看到了普希金的手稿和他的私人藏书。这样我在